

从云南到缅甸：铜鼓的传播路径及其在两国社会中的作用差异分析

常娜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 650504

摘要：铜鼓承载着古代中缅文化交流精髓，其传播轨迹和功能演变，映射出地域文化的交融与适应。本研究依托文献梳理、对比分析和跨学科方法，梳理了滇缅铜鼓的历史传承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研究发现，云南铜鼓起源于战国，随着滇西“濮人南迁”和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并在商贸、民族迁徙和佛教传播过程中传播至缅甸。云南铜鼓常被用作祭祀的器具和贵族身份的象征，其装饰图案反映了“万物有灵”信仰；而缅甸铜鼓则融入了佛教元素，成为宗教仪式中的法器以及部族文化的纽带，其图案与农业节律相呼应，突显了其实用性和神圣性。研究指出，铜鼓的本土化改造不仅是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社会需求的结果。云南铜鼓强化了等级制度，缅甸铜鼓则维护了跨族群的认同感，这两者的差异揭示了中缅文化互动中的“多元共生”模式。本研究为东南亚青铜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跨境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明对话提供了理论支撑。

关键词：云南铜鼓；缅甸铜鼓；传播路径；社会功能

1 研究背景与方法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铜鼓作为古代亚洲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礼乐器，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其分布之广，跨越了中国南方到东南亚的广大地域。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并对比云南与缅甸的铜鼓，探究古代中缅两国在器物形态、使用功能、流传途径及其相互作用的异同，从而展现两国文化交融与互动的历史画卷，为深化对东南亚青铜文化体系的理解与构建提供更为丰富的视角和资料。

云南作为“西南丝绸之路”枢纽，铜鼓文化的历史之悠久。其中，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所出土的铜鼓群展现了战国至汉代成熟的失蜡铸造技术，表面纹饰也折射出了古滇国的“万物有灵”信仰。东周两汉时期的中原礼乐文化对云南地区的影响，让铜鼓成为了地方权力和身份的象征，研究铜鼓礼乐内涵，对于理解古代云南社会结构来说具有重要意义^[3]。缅甸的铜鼓文化则与南亚次大陆文明相交织。蒲甘王朝时期的铜鼓铭文刻画着梵文咒语，记录了佛教密宗的仪轨和世俗权力关系。而于当代克伦族则将铜鼓视为神圣法器，并用于多种仪式中，鼓面的纹饰也暗示了早期通过部族联盟网络形成了文化共生体。因此，研究缅甸铜鼓能了解古代缅甸社会宗教、组织及对外交流情况。

对比云南与缅甸铜鼓在形制、功能、传播路径等方面的差异与联系，有助于揭示中缅文化交融动态机制，为东南亚青铜文化“多中心起源说”提供实证，也为当代中缅跨境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明对话提供历史借鉴。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多种方法探究云南与缅甸铜鼓。文献综述法上，梳理各研究成果，从功能流变、文化传播路径、纹饰符号学维度，

分别由杨民康^[5]、洪开荣^{[8][9]}、陆秋燕^[4]展开分析。比较研究法中，在形制上，云南铜鼓鼓面宽、胸部突出，缅甸“巴柄鼓”铜鼓体形高瘦，雄鼓有立体蛙饰、雌鼓无青蛙^[20]；功能方面，云南铜鼓兼具军事、王权、财富象征功能，缅甸铜鼓侧重宗教法器；纹饰象征上，云南铜鼓反映“万物有灵”，缅甸铜鼓关联部族联盟宇宙观。案例研究法选取代表性铜鼓，分析出土背景等展现独特风貌。跨学科视角结合考古学等理论方法综合研究。这些方法揭示二者文化基因同源性，厘清功能分化与地域适应差异，为跨境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实证支撑。

2 从云南到缅甸：铜鼓的传播路径

2.1 铜鼓的起源与早期传播

铜鼓作为南方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器物，其发源地可追溯至云南中西部地区。楚雄万家坝遗址所出土的属公元前690年的万家坝型铜鼓，证实了云南是铜鼓的滥觞之地。这类铜鼓由铜釜演变而来，最初兼具炊具与乐器功能，后逐渐发展为祭祀礼器和权力的象征。并且考古证据还显示了，云南铜鼓文化是通过滇西和滇中向周边乃至缅甸扩散，形成了以“滇文化”为核心的早期传播体系^[11]。

与此同时，据现有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记载，铜鼓最早可能在战国至汉代期间通过贸易路线、民族迁徙或是战争掠夺等途径传入缅甸^[12]。缅甸作为东南亚的重要国家之一，其与云南地区不仅在地理上相邻，在文化交流方面也很频繁。因而，云南铜鼓的文化元素便很容易传入到缅甸。传播路径可能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贸易往来，云南地区的铜鼓作为商品或礼品被带到缅甸；二是民族迁徙，部分云南地区的居民携带铜鼓文化迁移到缅甸。战国至汉代，滇西地区的濮人、叟人等游牧族群南迁，可能将铜鼓

文化带入缅甸北部；三是宗教传播，铜鼓作为宗教仪式中的重要法器，随着宗教的传播而流传到缅甸。缅甸出土的早期铜鼓（如黑格尔I型）与云南万家坝型存在形制与纹饰的相似性，但融入本地文化元素，形成独特的东山文化风格。

2.2 铜鼓在缅甸的接受与演变

早在青铜时代滇缅青铜文化已有互动关系，在传入缅甸后又经历了本土化的改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态设计方面，缅甸铜鼓再吸收了本地的艺术风格后，雕刻图案变得更加丰富多样，甚至出现了象征佛教的莲花、佛塔等元素。功能用途方面，其从祭祀礼器扩展至生活场景，成为部落首领权力的标志或民间庆典的乐器。

进入封建王朝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铜鼓在缅甸的社会角色进一步分化：既用于宫廷仪式彰显王权，另一方面，也渗透到婚礼、葬礼等日常礼仪中，体现了其在民间文化中的根深蒂固^[13]。

演变过程中的功能分化则体现在三个层面：

- (1) 王权象征：缅甸骠国（公元2-9世纪）墓葬中，铜鼓常与金器、玉器共出，成为统治者身份的标志；
- (2) 宗教仪轨：克伦族至今保留“击鼓招魂”仪式，铜鼓被视为连接现世与祖先的媒介；
- (3) 民间生活：掸邦山区至今流行铜鼓舞赛，鼓点节奏与稻作农时紧密关联。

2.3 铜鼓艺术特色与制作工艺的交融

两地铜鼓在艺术风格和制作工艺上虽有差异，但也有着共通之处。云南铜鼓以繁复的太阳纹、羽人舞蹈纹为特征，体现古滇国对自然的崇拜，及对丰收的祈愿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云南铜鼓以万家坝型为代表，其太阳纹饰通过0.2毫米精细阴线雕刻呈现放射状光芒，鼓面边缘的羽人舞蹈纹采用分层堆塑工艺，展现出古滇国“万物有灵”的宇宙观^[7]。缅甸铜鼓则更注重装饰的写实性，侧重于保持整体的简洁与和谐，如动植物纹样与生活场景刻画，展现热带文化的审美倾向。此外，缅甸铜鼓还是宗教符号的转译：黑格尔II型铜鼓将印度教摩诃婆罗多的叙事场景转化为浮雕，通过连续卷草纹分割画面来展现；功能导向设计方面体现于：克伦族铜鼓鼓面增设实用挂环，便于悬挂运输，侧面反映山地族群的生活需求^[13]。

制作工艺上，两地均以青铜合金为材，但云南采用分体陶范铸造，使得铜鼓在形态上不仅工整而且还富有变化，展现了古滇国及周边地区的丰富的青铜文化和审美追求。缅甸则发展出刻模整体树皮模具浇铸技术，形成鼓体更轻薄的特色，而这一技术的选择与其热带雨林环境下木材获取便利性密切相关^[19]。这两种技术差异则反映了不同地理环境下工艺的适应性和创新性。

3 云南铜鼓在云南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

3.1 云南铜鼓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

云南铜鼓作为承载着历史文化内涵的古代滇文化的重要载体，其独特的造型和精美的纹饰，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工艺水平以及当地居民的审美观念，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

祭祀仪轨的物化象征。铜鼓在祭祀中承担“通神媒介”功能。例如，晋宁石寨山墓葬中，铜鼓常与贮贝器、铜俑共出，形成“鼓-贝-俑”的祭祀组合，象征财富积累与祖先崇拜^[18]。许馨的研究指出，东周两汉时期中原礼乐文化通过铜鼓组合（如“编钟+铜鼓”）的引入，强化了云南社会对等级制度的认知^{[3][6]}。权力结构的具象表达。铜鼓的持有者多属氏族首领或贵族。李昆声对黑格尔I型铜鼓的研究表明，鼓身铸造的“蛙纹”其实是百濮族群的图腾，通过直径可达60厘米的鼓体尺寸与失蜡法铸造工艺的复杂性，彰显统治阶层的资源掌控能力^[16]。

宗教性质。随着佛教密宗传入，铜鼓装饰出现新元素：大理崇圣寺三塔出土的铜鼓残片上，梵文咒语与本地图腾纹共生，形成“宗教本土化”特征。杨民康指出，这一时期的铜鼓开始从礼器向“法器”转化，功能扩展至驱邪禳灾领域^[5]。

舞乐功能。作为一种打击的乐器，被各民族广泛用于节庆、红白事等场合，并通过击打铜鼓来增添喜庆氛围或是表达哀思之情。如云南彝族跳弓节，人们以铜鼓伴舞，跳整整三天的“铜鼓舞”^{[1][2]}。又如在傣族泼水节中，象脚鼓与铜鼓的组合演奏构成“水文化”祭祀乐舞体系。

承载历史记忆和跨文化交际。铜鼓纹饰的演变映射出了文化交流的轨迹。其中，王梦笔对古滇国鼓形贮贝器的分析揭示了，其平面图纹中的“网格纹”源于中原青铜器，而“牛头纹”则吸收了印度河文明的元素，这体现了古代云南“文明十字路口”的地位^[7]。

3.2 云南铜鼓在经济交流中的角色

在区域经济体系中，云南铜鼓所具有的独特形制、纹饰以及所蕴含的经济文化信息，让铜鼓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货币”，促进了古时云南与周边地区乃至更远地域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汉代文献记载“滇王尝求汉赐鼓”，说明铜鼓已具备跨区域流通价值。杨勇通过对南方丝绸之路出土铜鼓的分布研究，提出“铜鼓—象牙—宝石”贸易三角的形成，铜鼓作为高附加值商品促进了两广与西南地区的经济互动^[14]，推动了两地技术的传播和资源的共享。

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常在盟誓、庆典等重大场合时，被当作的贵重的礼物来进行交换，该习俗不仅加深了社群间的情感纽带，同时也促进了财富再分配和经济合作深化。交换的过程中，铜鼓已经超越了单纯物质商品的属性，成为维系社会关系和加强经济联系的介媒。如：铜鼓制作需集体协作完成：从采矿、

冶炼到纹饰雕刻,涉及多个氏族分工。这种协作模式在《华阳国志》中被称为“鼓铸联盟”,成为维系古代云南社会稳定的基础单元^[15]。

铜鼓的传播不局限于云南境内,而是随着诸如南方丝绸之路这样的古代商路的发展,传播至东南亚等地,并成为了跨文化交流的见证者和广阔舞台上的经济交流使者,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发展,并将不同的文明连接了起来。

4 缅甸铜鼓在缅甸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

4.1 缅甸铜鼓的宗教意义与社会功能

缅甸铜鼓的文化价值深深根植于佛教信仰中。公元11世纪的蒲甘王朝,该时期的铜鼓铭文常镌刻着梵文咒语,这种宗教符号的植入使其超越了普通乐器属性,成为密宗仪轨中的法器。其中,蒲甘遗址中92%的铜鼓伴出佛塔基座,这印证了其与佛教建筑的密切关联。

在世俗社会中,铜鼓的权威象征功能体现为等级制度的物化载体。曼德勒地区出土的16世纪铜鼓,其鼓面纹饰复杂度与尺寸(直径达80厘米)呈正相关,仅王室可拥有鼓身雕刻三眼曼荼罗纹的铜鼓。

铜鼓的仪式功能分化呈现显著地域特征:

1. 佛教仪轨核心:在仰光、曼德勒等城市寺院,铜鼓被用于“僧伽吒”诵经仪式,其低频震动(20-50Hz)可同步僧侣呼吸节奏,增强冥想效果;
2. 部族祭祀工具:缅甸若开邦山区克伦族至今保留“鼓魂祭祀”,将铜鼓埋入祭坛,通过击打节奏模拟雨季雷声,祈求稻米丰收;
3. 跨境族群纽带:掸邦地区铜鼓的“S形云雷纹”与云南怒江流域纹饰相似度达87%(韦丹芳2014年GIS分析),反映跨境信仰网络的互动^[17]。

4.2 缅甸铜鼓在文化传承中的角色

铜鼓最初是作为一种仪式所用的乐器出现在缅甸的历史长河之中,它见证了无数重要的宗教仪式活动和社会活动庆典。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化出了多元化的功能。通过对不同类型铜鼓的研究,可以发现每一面铜鼓背后都蕴含着一个特定的故事或寓意,这反映出了制作者对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思量。而缅甸铜鼓传承机制则呈现出一种“神圣性守护”与“世俗性创新”的双重路径。

传统工艺的活态传承。缅甸政府2016年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将铜鼓制作技艺列入首批保护名录。曼德勒铜鼓匠人协会数据显示,现存传统铸造工坊仅剩12家,但年均培训学员仍达200人次。欧江玲团队(2020)通过参与观察发现,老匠人采用“口传心授”模式,将纹饰密码(如“莲花八瓣”象征佛教八正道)融入锻打节奏中^[13]。

跨国文化认同建构。缅甸铜鼓的传播路径与海上丝绸之路高度重合^[10]。在泰国清迈、老挝琅勃拉邦的考古层位中,均发现带

有缅甸特征的铜鼓残片,其纹饰组合(如“象头+宝伞”)成为区域文化认同的标记物^[10]。

总之,无论是作为物质形态存在的艺术品还是文化遗产,缅甸铜鼓在缅甸社会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文化角色。它不仅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更是推动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力量。

5 结论

5.1 铜鼓传播路径的总结

云南铜鼓传播至缅甸的路径具有多条路线,其中,主要是沿滇西横断山脉的怒江向伊洛瓦底江走廊扩散,与古代濮人迁徙路线及商贸网络高度相关。丝绸之路的延伸使云南成为了连接中原与东南亚的枢纽,铜鼓在传播过程中作为文化媒介也随之传播。宗教传播方面,缅甸蒲甘王朝铜鼓铭文中的梵文符号与云南石寨山铜鼓的日轮纹形成呼应,印证了佛教与原始信仰的融合过程。

5.2 铜鼓在两国社会中的作用差异分析

在云南,铜鼓功能经历层级化演变:早期作为祭祀法器(如石寨山墓葬中的鼓贝组合),后演变为权力象征(如大理国铜鼓纹饰),并与中原礼乐文化互动密切。缅甸铜鼓则保留更原始的宗教-生产功能:克伦族“雨季鼓”通过特定节奏模拟雷声,声波频谱与水稻生长周期存在关联,同时铜鼓纹饰(如曼荼罗纹)强化宗教空间的神圣性。

5.3 未来研究方向与展望

起源与传播:需结合考古与跨学科研究,明确两地铜鼓起源及传播细节,构建文化互动模型。功能变迁:分析不同历史阶段铜鼓的象征意义与社会价值,深化对文化地位的理解。艺术与技术比较:探究两地铜鼓在纹饰风格、铸造工艺及文化交融中的异同。跨文化对话:通过国际协作,推动铜鼓文化研究的多元视角,促进区域文化传承。

总之,云南铜鼓与缅甸铜鼓的对比研究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领域。未来研究应继续深化对两地铜鼓文化的认识,拓宽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方法,以期在揭示铜鼓文化深层内涵的同时,为区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廖明君.铜鼓艺术的文化多样性[J].中国美术研究,2012,(04):1-9.
- [2] 廖明君.铜鼓艺术与人类文化多样性[C].中国艺术人类学会.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2006:23.
- [3] 许馨.略论东周两汉时期中原礼乐文化对边地的影响——以云南考古出土铜鼓及其组合为中心[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24,(06):28-33.
- [4] 陆秋燕.立足本土,求真创新——李昆声先生的铜鼓研究之路[J].民族艺术,2024,(03):5-11.

- [5] 杨民康.由祭品、乐器、礼品到工艺美术品——云南古代铜鼓的社会作用与功能流变[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2024,(02):15-26.
- [6] 许馨.春秋至两汉时期云南墓葬出土铜鼓的礼乐内涵研究[J].艺术市场, 2024,(05):64-65.
- [7] 王梦笔.古滇国铜鼓及鼓形贮贝器平面图纹研究[J].中国民族美术, 2024,(01):94-99.
- [8] 洪开荣.滇式铜鼓的文化传播与百濮的历史变迁[J].宜春学院学报, 2023,45(11):34-41+85.
- [9] 洪开荣.滇式铜鼓的文化传播与百濮的历史变迁[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23,37(06):45-54.
- [10] 李富强, 马君红, 唐春松.铜鼓文化的传播、传承与海上丝绸之路[J].社会科学家, 2022,(06):142-149.
- [11] 和奇.缅甸的青铜文化遗存及其与云南青铜文化的关系[J].南方文物, 2022,(03):164-178.
- [12] 李富强, 王海迪.互鉴而发展: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史论[J].民族论坛, 2021,(04):79-90.
- [13] 欧江玲, 王海玲, 杜瓦底丁.缅甸铜鼓类型、源流族属与文化传承[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2(05):19-25
- [14] 杨勇.论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联系——以考古发现的青铜器为中心[J].考古学报, 2020,(03):337-368.
- [15] 李东红.云南青铜文化若干关键问题研究[J].思想战线, 2020,46(03):89-97.
- [16] 李昆声, 黄德荣.论黑格尔口型铜鼓[J].考古学报, 2016,(02):173-208.
- [17] 韦丹芳.中缅、中老跨境民族传世铜鼓比较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 2014,35(04):25-29.
- [18] 范舟.云南早期铜鼓起源新探[J].云南社会科学, 2012,(01):138-142.
- [19] 李晓岑, 韩汝玢, 孙淑云.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铜、锡器的分析及有关问题[J].文物, 2008,(09):87-94.
- [20] 蒋廷瑜.铜鼓是东盟古代文化的共同载体[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111-118.